

很久没去纽约了。上一次去纽约还是当年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是1981年。那时候我觉得纽约是个非常新鲜前卫令人羡慕的地方。因为那时的中国还很贫瘠闭塞,从未出过国门的我认为纽约一定是世界上最先进时尚的地方了。

2015年10月,时隔34年之后又一次来到纽约。我没有料到,这一次

一阵小跑声,学校走廊里一个男生小声急促地叫我,我立定问他,有什么事吗?

他期期艾艾:我——我能到你美术办公室去说吗?我点点头,他进来小心翼翼关上门后,将手上卷着的画纸摊开我面前说:老师你看,我觉得自己画得挺好的,为什么只有65分呢?我看他这张还没我好呢,为什么你给了他70分呢?他把同桌的那张画也摊了开来。

啊,原来是讨说法来的。这是一张美术作业,临摹书上的一幅写意国画——梅花麻雀图。这算是期中考试了。

两张画摊开桌上,我给他分析:你这张,梅花点得还蛮像样,麻雀的形体姿态也不错,可偏偏是“点睛之笔”不准确,眼睛画偏了,不是犯了常识性的错吗?他这张也有缺点,梅花浓淡深浅缺少变化,但画面主体麻雀画得还是到位的……

他听明白了,似乎也服了,但还不走,磨磨蹭蹭,抓了一会儿头皮,终于说出了要说的话:老师,你这次能不能开开恩,送我5分,下次还你行不行?

我笑了起来,教书好些年了,还没碰到这样的学生。

你说说看,为什么一定要送你5分呢?你表扬过我的,说过我画画蛮好的。啊,我表扬过你?

是的,你表扬过我两次,一次画素描头像,你说我暗部画得蛮透气没有闷掉。还有一次画水彩,你说过我天空颜色染得蛮透明没有弄脏。

可是这次你只能得65分呀,再说这是考试,老师应该公正是不是?

可是我这次已经向我爸说过我美术考得不错的,否则老爸要说我吹牛,又要打我的……

65分已经超过及格线了,以后再努力一下就是了。

不不不,老师我只好实话告诉你,这次期中考试,几门主课我都没考好,语文65分,英语刚及格,数学只得55分。我爸气死了,用皮带抽我,用脚踢我,说我没有一门考得像样,我说我副科蛮好的,美术至少能考70分……老师,你看——

他撩起了一条裤腿,露出了几条青紫的伤痕。

我不再多说,拿出一张宣纸,让他重画一幅。

半小时后,我用朱笔在他的画上写了个“70”,很醒目。出门时,他向我鞠躬,又轻轻问一句:老师不会告诉其他同学的是吗?我含笑。

多年以后……

我在地铁月台上等车,一旁座椅上一个男子向我微笑行注目礼,而后站起来说:您不是教我们美术课的老师吗?你是?我记不得他是哪位了。

他说,我就是那个问你讨分数的学生呀!于是我想起了20多年前发生在我办公室里的这一幕。月台上我俩相互把上述故事一点点补充完整。

我问他现在何处工作,他说了一家公司的名称。

那么,你現在是否经常向你的老板要求加分?我和他开起了玩笑。

他笑了,有些腼腆地说,我们公司人不多,我当家。

啊,那你就是老板了,你后来学的什么专业?

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搞软件设计。

你过去数学好像不怎么好的,怎么选了这一行?

老师,你还记不记得,那次在你办公室里你说我的一句话,你说,像你这么聪明想得出讨分数的人,怎么可以数学不及格呢!

我说过吗,记不清了。可是他却一直记着,并为此改变了自己。

讨分数的人

徐慧芬



名的博物馆,拥有许多伟大艺术家的丰富藏品。

去之前儿子就说,网上有住家给旅游者提供临时住宿项目,比宾馆要便宜不少,要不要定一家?美国有很多家庭对需求者开放,在房间空余的时候给国际学生或者旅游者提供住宿。我对儿子说,住人家环境相对自由,价格又便宜,预订一家。

飞行了一天,经历了误机、待机、换机、等座位、飞行,差不多深夜才到达那个位于皇后区135街的五层小楼第二层,发现房主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单身女孩子,有两个房间,简单干净的家具,还有一只猫,最让我们觉得方便的是,她是一个讲中文的华裔。第二天一早,小房东就离开纽约去外地了,这个干净舒适的小套房外加那只漂亮的猫咪就属于我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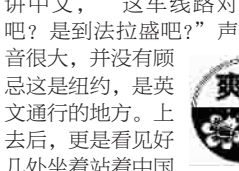
第二天,儿子拿着手机,按照上面的指引带我们去找地铁,地铁四通八达,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登上了F线地铁,进入列车感觉就像是在北京的二号线,里面结构几乎一样。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人还没上去,已听到有人讲中文,“这车线路对吧?是到法拉盛吧?”声音很大,并没有顾忌这是纽约,是英文通行的地方。上去后,更是看见好几处坐着站着中国人。我心里说着,这么多中国同胞都到纽约来了?

法拉盛是个著名的地方。网球迷的我知道每年的网球都在这里举行。怪不得网球明星李娜说过,她喜欢美国,因为每次到这里都有一种在自己主场打球的感觉。难怪我也有错觉了,觉得这不是外国,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到处都是中国人。不仅如此,街道两旁布满了各类中国商铺,店面琳琅满目都是中国字样招牌,播放着中国音乐,甚至有一位大妈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复读机,机器里不停地有个东北女声在叫:嗨!停车啦停车啦,二十四小

时停车免费一小时啊……

在一家上海馆子里吃过荠菜炒年糕和小笼包之后,到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多幅大师名家的作品真迹,沿着长廊欣赏,余光里还时不时地掠过一些讲着中国话的游客,擦肩而过之际大家相视微笑心照不宣。

下午应一位老朋友之邀来到一家广式餐厅饮茶,进门就被震撼了。整个厅堂足有五六百平方米,密密麻麻坐满了顾客,几乎没有空位,且满眼是一水的中国脸,各种方言充斥耳际。正想着怎么就没有一个洋人面孔?终于找到一个,夹杂在一桌广东人中间,不时呵护着身边一个小混血。哦,是娶了中国太太的美国人。



饭后我要去看看著名的时报广场,走在被千万人踩得高低不平的老旧砖地上。四周建筑入云,悠远的天空被挤得只剩了巴掌大,一辆车身喷了鲜亮颜色的双层无顶大巴从身边缓行过去。遥望街对面,看到一片斜坡式的连位座椅,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下面一块似是平地的面积,有些人在走动。

等等。一转眼,高一小学已经步入甲子之年,我很欣慰地看到如今母校还保留着自己当年最爱的这两个操场,因为它们承载了我童年时代对体育的热爱,见证了我童年时代对体育的启蒙。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一小学的体育活动就已经丰富多彩,开展得如火如荼,我想

这也是为何高一小学能培养出不少体育界人才的最重要原因。当时学校有很多体育小社团,有篮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等等。小学一年级时,我是校足球队队员,二年级开始打篮球,所以,我的小学生涯除了读书之外,还有很多运动的时间和空间。

高一小学不仅为我童年时代的体育运动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更为我将来成为一名国家教练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我在高一小学读四年级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一些品德兼优的高年级学生便承担了老师的责任,当起了“小老师”。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晚上晴朗,夜空里有大朵白云。有人说云是天神的玩偶,可见天神也不舍得夏天的夜云,所以在天上彻夜玩着云朵。

我和我丈夫出去散步,路过门房间,门卫也坐在花园里乘凉。突然从门卫室开着的窗子里传出“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声音:“喀滴嗒,喀滴嗒,喀滴嗒滴嗒。”——原来,一头白发的门卫每当上夜班时,都准时听小喇叭广播。没想到现在“小喇叭”节目还用我小时候听到的片头,居然五十年来未曾变。

我们三个人在大门口听着自己上小学前的熟悉声音。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然后,孙敬修老爷爷开始讲《西游记》的故事了。

这个门卫待人总是客气。他看上去驼背了,头发也白了。当讲起孙敬修老爷爷,我们就开始说起自己的小时候。那时我们三个人都远远没认识彼此。小时候总是听完小喇叭广播才睡觉的,小时候夏天听广播最有趣,因为都在外面乘凉,所以有同伴一起听。

夏末的晚上孕育着变化,但有两样东西原来是不变的。一样是天上大朵的云。另一样,谢天谢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

儿子说那就是时报广场,我以为听错了。这么小一块地方,时报广场?以往看到的照片是从特定角度上拍的,实际上时报广场就是这么点儿地方。算了,别说了,失望之余想起台湾日月潭,也是异曲同工。实地一看,什么都还没有,一小片水潭似的,还不如北京的北海大。想不到纽约的时报广场也给我打了一场马虎眼。

儿子的朋友贴心热情地要陪我去逛商场,一定以为我会像其他中国来的旅游者一样要把纽约的时髦货塞满大箱子带回家。结果是五大道、麦迪逊街各种名店逛了一圈。我自己也纳闷,咋就什么也没看上呢?商家的店员一看来自中国的财神爷竟然没花钱扫货,一脸的热情瞬间消失。

最后实在走累了,长途跋涉快成拉练啦。打道回府,依旧进地铁。

坐在里面昏昏欲睡,耳边充斥各种语言,西班牙文、德文、波多黎各文、韩文、中文、广东话……就是没有英文。

这是纽约,一个丰富拥挤宽容海纳百川的文化老城。

其中有上音乐的、语文的、体育的等等。我当时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体育运动也很突出,所以担任了高一小学1-4年级的体育老师。这也是我的小学学习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一开始接到当体育“小老师”的任务时,我的内心是有一丝忐忑的,担心还是学生的自己是否能胜任体育老师这样的一个角色。于是,我认真准备体育课,准备教具教材,比如上体育课要跑步,需要画跑道,我自己就拿铲子和石灰粉画线、画圈。渐渐的,我心中的忐忑逐渐消失,最终得心应手地教了不少学生。一直到七年级,我依然还在高一小学当体育老师。那个年代,小老师们教书的信念就是为祖国出力,为祖国争光,这种信念一直影响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每当我在打排球时,我也只有这一个信念:为祖国争光,这种信念,让我最终获得世界男排最佳二传手。因此,可以说,我在高一小学这段独特的体育“小老师”的经历为我今后的人生轨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的回忆,犹如舒曼钢琴作品《童年情景》再现。

记忆中的学校

十旧谈

沈富麟

路名,是城市历史文化的标识。近代以来上海路名的发展演绎,是上海城市变迁的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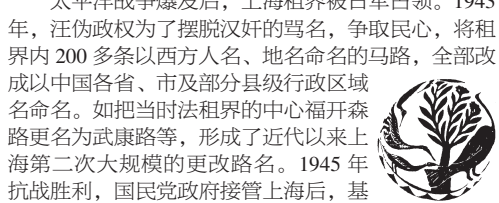
19世纪40年代前的上海,道路没有管理机构和管理法则,路名都是根据当地习惯叫起来的。如附近有教堂就叫“教堂路”,有庙就叫“庙街”。老城厢的道路大多使用“街”、“巷”、“弄”等。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张,道路建设迅速发展,取路名摆到了当局的议事日程。1846年英租界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曾给租界内的道路取名。19世纪60年代后,租界当局对租界内的路名作了调整和重新取名。在英租界内,通常以中国行政省命名南北向道路,以中国城市命名东西向道路。如南北向的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东路等,东西向的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等,这些路名一直沿用至今。美租界内的路一般以上海周边城镇命名。至今仍在使用的有吴淞路、昆山路、乍浦路、南浔路等。法租界的路开始以中国的山川命名,后改用殖民主义者心目中的杰出人物命名,如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等。此外,租界内的路也有以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基督教的教士名字命名的,有以外国驻华公使和驻沪总领事名字命名的,还有以工部局和公董局总董名字命名等。而华界的路名,尤其是郊区,基本保留了江南水乡特色,一般以“泾”、“浦”、“塘”、“浜”、“行”等命名。如新泾路、彭浦路、蒲汇塘路、肇嘉浜路、闵行路等。上世纪30年代,为发展华界,在五角场一带以“国”、“政”、“民”字打头,命名了一批路名。如国定路、国权路、政本路、政通路、民京路、民庆路等。从上海开埠到20世纪40年代初的百年间,上海共有400多条马路命名、更名。这是近代以来上海路名的第一次重大变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1943年,汪伪政权为了摆脱汉奸的骂名,争取民心,将租界内200多条以西方人名、地名命名的马路,全部改成以中国各省、市及部分县级行政区划命名。如把当时法租界的中心福开森路更名为武康路等,形成了近代以来上海第二次大规模的更改路名。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接管上海后,基本承认汪伪政权对租界路名的更改,但对其中一部分路名作了变动,把复兴、建国、中正等用以路名。这是近代以来上海路名的第三次变更。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城市建设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一些带有殖民、封建和统治色彩的路名被具有纪念意义的路名替代。如兴国路替代了雷士达路,瑞金路替代了中正南路,淮海路替代了林森路等。而新修筑的道路路名则基本沿用了传统做法,以不重复为原则,将全国各地行政区划名称用作道路名称,其中名城、圣地、胜地首选。同时,将上海道路位置与全国相关省市位置相对应。如沪北的闸北区、虹口区北部,多见华北地名;沪东北的杨浦区,常见东北地名;沪西北的普陀区,频现西北地名;处于上海东部的浦东,则以东入黄海的山东省地名命名。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上海是运用地名命名道路最多的城市。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道路建设突飞猛进。一些新建新辟的道路更具时代特色和国际化,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美盛路、英伦路等。

如果城市是一部书,路名就是书的索引。近代以来上海的地理变迁、政治事件、经济发展、文化传承,都深深印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上海的许多道路历史上几易其名。如现在的延安东路开始叫“爱多亚路”,1943年改为“大上海路”,1945年改为“中正东路”,解放后才改用现名。路名,可以牵出许许多多往事如烟、柔肠百转的故事。路名后面,其实隐藏着整整一部城市的发展史。

路名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忆。上海数以几千计的路名,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屈辱与抗争,建设与发展,光荣与梦想。把路名文化作为城市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使路名成为一部生动的城市历史文化教科书,增强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应是有关方面当下要做的一件事情。



夜光杯

